

## 理论与争鸣

## 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张炯

毛泽东是20世纪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诗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及其文艺理论,总结中国文艺实践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做出划时代贡献的革命文艺指南。它所具有的真理性的意义,将会在我国和世界文艺史上永放光辉。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包括他的文艺思想句句是真理。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都总有自己的历史认识的局限,也不可能不犯错误。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其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也有过理论的严重失误。例如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结合历史实践去区分真理与谬误。对于毛泽东思想包括其文艺思想,自然也应如是。

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于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的年代,也即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时代。这是中国人民从备受列强欺凌和侮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摆脱列强的压迫和剥削,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翻天覆地的时代。旧秩序被埋葬,新秩序被建立,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性特征。历史巨大而深刻的变动,并没有现成的指针。中国的革命家们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理论,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去摸索和寻找正确的途径,从中产生自己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建构自己的切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包括文艺方面的理论。当时就提出“平民文艺”的主张,提出文艺领导权的问题。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还提出了文艺家应该到工农兵中去的呼吁。左翼文艺的蓬勃发展中,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左翼文艺指导的必要性,提出文艺为革命服务以及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等问题。到30年代末,不仅革命文艺在苏区、白区和后来的人民抗日根据地均有蓬勃的发展,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许多宝贵的经验。1939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新文艺伟大成就时指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原则,实际上也适用于新文艺的建设。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相当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论著,并有时间去深入思考中

国革命的广泛经验与教训。他撰写了从政治、军事到文化等多方面的理论著作,包括《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他还阅读了《鲁迅全集》。那时,大批文化人,包括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他们在推动人民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的发展过程中,也遇到和产生许多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曾做过许多调查研究,找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工作者谈过话。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问世的。正由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密切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使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当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华。这篇讲话,虽然着重谈的是文艺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却涉及文艺的多方面规律的认识。如涉及文艺本质规律的文艺的观念形态性、审美创造性、社会功能性,文艺外部和内部规律的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以及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提高与普及、继承、借鉴与创新、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等的关系。《讲话》从多方面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批评论、生态论的原理。正由于毛泽东对文艺的基本理论问题都做深入的思考,他才出色地结合文艺实际,从理论上深刻地解决和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

《讲话》首先阐明文艺的人民主体性。基于人民是历史创造主体的唯物史观,《讲话》指出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认为人民才是文艺的“工作对象”。因此提倡文艺家必须熟悉人民,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讲话》又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认为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而且指出,文艺与现实生活“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因此,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振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样,毛泽东就深刻地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原理,阐明了文艺源于生活又可能高于生活的审美创造本质及其审美功能的特质。毛泽东还出色地运用矛盾论去研究和分析文艺内部和外部的系列矛盾又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指出正确处理文艺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文艺创作中提高与普及、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互动和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创作中的世界观与创

作方法的区别与统一等关系的重要性,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有关方面的规律。《讲话》指出文艺可能起“伟大作用于政治”,要求文艺创作中“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它主张文艺作品既要提高,也要普及,并指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讲话》还认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指出“文艺批评应该发展”,文艺批评存在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非抽象不变。它提倡文艺家要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指明,“一般的宇宙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等等,如果我们联系文学艺术史的实际,都不难认识到《讲话》的深刻真理性。毫无疑问,《讲话》所阐明的上述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讲话》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自然与当时整个民族的关注重心在于政治,在当时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有关,也与毛泽东认为文艺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系有关。《讲话》当时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认为“在现今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种论断,当然与那个时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中,确实少有文艺家能够超政治而独立的情况相关。但从更广阔的历史考察,这种论断却不够周延,未免把复杂的文艺历史状况简单化了。由这种论断后来推演出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做法,更忽视了和平年代文艺常有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丰富多样性以及没有政治内容的,可能为不同阶级欣赏的文艺作品的客观存在。因而新时期邓小平总结在这一问题上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认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阶级斗争既可能表现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可能表现为文化斗争、思想斗争。作为经济基础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通过政治中介才能反映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去,后者也要通过政治中介才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文艺与政治虽然存在质的区别,也并非相互隶属,但文艺鲜能脱离政治,而且能够反作用于政治,这同样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因为,文艺家总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情感,并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到自己的作品中。而任何时代的国家政治机构也总不同程度地要求文艺为其利益服务。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有新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这样的论断,阐明了经济发展对文化、包括对文艺发展的支持作用;后来他在《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中,在近年才发表的他的书信与谈话中,更提出许多新的思想。其中,重要的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重大文化方针的提出。早在1950年他就给戏剧界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后来他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更阐发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关于“双百”方针,他说,“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这无疑是很正确的思想。可惜,1956年毛泽东基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先是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来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外古今的文化遗产都视为“封资修黑货”而一概打倒,从而完全抛弃了上述正确的方针,结果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与科学都受到灾难性的损害。但这从反面也恰恰证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双百”方针的正确。

体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从而产生实事求是的理论的典范。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具有严整的理论体系,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文艺运动的完整纲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先后被翻译到许多国家去,受到各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的广泛重视,对世界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历史的新进步,自然也与前人的历史功绩分不开。今天,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缅怀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学习毛泽东思想及其文艺思想,继承其正确的科学论断,扬弃其已被实践证明的错误的部分,并从他的实践和理论的失误中吸取历史的教训,这应该是我们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的惟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们光大和发扬前辈伟大历史人物的思想财富的惟一正确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促进我国文化和文艺的进一步的繁荣。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

## 坚定对党的信念 推动诗歌繁荣

□商震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和中国作协党组的部署,我扎实地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并组织本单位的同志学习。通过学习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有了整体体会。特别是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宏愿。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就是要我们展望未来,把蓝图变为现实。

我们知道,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凝聚中国力量,就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思想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及有力的舆论支持与良好的文化条件。

我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结合我的岗位,就是提高刊物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诗刊》一直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众所周知,《诗刊》正是在毛泽东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才得以创刊的。毛泽东为《诗刊》题写了刊名。《诗刊》的创刊号上,正式公开刊发了毛泽东的16首诗词。其中就有《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脍炙人口的篇章。大家知道,中国最早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文化典籍是《诗经》。《诗经》在其他方面的意义与成就我姑且不说,只

说《诗经》对我国诗歌创作有着规范意义的影响。或者说《诗经》诞生,便已经为中国诗歌的创作树立了榜样,建立了传统。这个榜样和传统就是叙事与抒情的平衡。而毛泽东的诗词,不仅继承了叙事与抒情平衡这一传统,还为我们树立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从《诗刊》创刊至今,《诗刊》几代人都围绕着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这一核心价值而努力工作着。57年来,社会有过动荡,《诗刊》有过起伏。因为,社会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会得到《诗刊》的“有诗为证”。说句不夸张的话,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诗歌史。一部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诗歌创作史。毋庸置疑,《诗刊》史,就是当代中国的诗歌史,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史。一个非理性的论断是,诗歌是记录社会发展和社会本质最可靠的文字。

说诗歌的文字可靠,除诗歌这门艺术形式本身对所描写的事物要求有鲜活的现场感和真实情感的在场外,重要的是中国诗歌的审美情趣与中国传统的美德规范是一致的,那就是忠、孝、礼、义、廉、耻。而这个传统的美学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又与我党的党性和人民性相一致。应该可以这样下结论,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火

炬,是社会进程中宏观与微观的直接反映。所以,诗歌阵地,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最敏感的前沿阵地。为此,作为《诗刊》的负责人之一,我感到了心头压力也背负着荣耀与自豪。所以,《诗刊》一定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用诗歌这个独特的艺术形式,形象地构筑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建设、改革的精神画廊。努力促进我国诗歌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良好局面,激发广大诗人的热忱,继承优秀的民族诗歌传统,借鉴国外有益的表现手法,创作出更多表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国风格的优秀诗篇,为中国当代的文学事业增添绚丽的光彩。

《诗刊》将自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敏锐反映诗歌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诗歌走向群众的新途径,确立自己的高格调、高品位和鲜明特色,为培养扶持新人、繁荣诗歌创作、建设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作出应有的贡献。

借用毛泽东给《诗刊》第一任主编臧克家为《诗刊》创刊而写的信中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想,毛泽东说:“《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

## 期刊人的中国梦

□高叶梅

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联系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深刻感受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勇气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的每篇讲话都很精彩,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他的讲话还非常朴素,把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与实现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紧紧相连,关于中国梦的诸多阐释,都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期待息息相关。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些朴素的话,是深具打动人心、凝聚人心的魅力的。

我个人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一次革命动员,如同革命与战争年代提出“推翻旧世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由此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万众一心,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的国情基础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历史与今天和未来连结起来,非常契合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和文化心理,成功地凝聚了中国力量。

中国是历史上惟一同时进行着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国家,全球化的

信息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也都在中国同步发生,由此出现了社会紧张,社会压力增大,贪腐现象造成的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均,这一切都严重地挑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对未来的信心。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大之后对一系列重大举措随之而来的实践,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中国道路问题,即改革开放30年成果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实现中国梦必须走的道路,也是党中央对全中国人民能够分享改革红利的承诺,自然,最重要的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也就是制度红利。

总而言之,“中国梦”把国家的意愿和抱负与全体中国人利益做了最大交集,成为把全体中国人思想意识和对幸福生活的殷切希望高度联系起来的价值纽带,成为“一个能在人们心中激起共鸣的目标”。

具体到我们的中国梦,一是从文学事业,二是从办刊职场来体现。文学是一个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国家不可低估的软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宏伟蓝图势必会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创造更加良好的文化生态,我们期待着,同时也对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就落实在办好文学期刊上。文学期刊是文学的前沿阵地,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摇篮,承担着中国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我们的责任意识可以这样概括:牢固树立,多抓精品,促进优秀文学传播的有效性。

导向包括政治导向和审美导向,我认为中国作协所属报刊社都具备较高的职业敏感和较强的

阵地意识,“三俗”和“三观不正”等作品很难进入我们的杂志;抓精品,就是我们常说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中国理想、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艺术原创品格的文学作品;而我们面临的最大课题是传播问题,如何让传统文学以及美好的汉语传承在我们手里获得更有效的传播。

近些年互联网的传输介质又从在线到无线,眼见着传统出版物受众群越来越小,文学期刊的命运更是日渐式微,这是全球背景下传统行业的整体衰落,作为一个办刊人,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是被动地坚守还是积极地坚守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新媒体仅仅理解为是多了一种创作平台的话,那就大大地低估了传播的技术革命对我们文学的影响了,今天谈网络文学其实就是在谈青少年的阅读问题,中国人的阅读问题,以及中国文学的未来和汉语传承问题。青少年在怎样的阅读中成长,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被怎样的文学所限制着,这直接关乎一个民族的未来和中国文学的未来。

我的梦想非常具体,积极去分享信息时代的一切先进技术,学会运用新媒体在办刊方式和传播营销上进行一些尝试,既达到对文学期刊的传播,也使文学佳作获得迅速传播。总之,只要思想不封闭,我们的努力一定会产生意义,意义在于,文学百年形成的审美标准和文学的美学传统不会因纸质出版物的不断边缘化或者某一天消失而一起被遗忘掉,它已经转移战场,借助电媒成长,流芳百世。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办刊人的梦想。

## 探寻中国新诗研究的切入点

需要深入到诗歌本体艺术层面的各个环节。王泽龙从事诗歌研究以来,一直执着在诗歌本体研究领域孜孜耕耘,他的第一部诗歌研究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主要讨论的就是有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本体层面的问题,之后出版的《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更是他诗歌本体研究的又一力作。《中国新诗的艺术选择》中所收录的论文也体现出了作者对诗歌本体研究的重视。涉及到新诗的文体、节奏、韵式、结构、语言及意象等本体方面的问题。《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内涵论析》中讨论了诗歌节奏的含义以及中国现代诗歌节奏的特色,《20年代现代诗歌节奏诗学初探》讨论了20年代诗人们在诗歌音节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及其特征》梳理了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发展脉络并归纳了它的总体特征。《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中讨论了现代诗歌意象对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选择》一书延续王泽龙一贯的治学风格,行文清新稳健,思路清晰简明。全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共有二十七篇论文。上篇为现代诗综论,宏观描述新诗发展的整体脉络,总结新诗嬗变的规律特征,反思现代诗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篇为现代诗学研究,主要是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方面的探讨与阐释。下篇为中国现代诗人论,选取了现代新诗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冯至、穆旦等。全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梳理与横向论析并重,诗歌历史考察与文本阐释相得益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开阔的研究视野。

孙玉石在谈到《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的创作时说他是从文化的、历史的、审美的三个视角“观察和透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及其发展的轨迹。”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视角考察王泽龙所建构的新诗研究体系。

首先注重从历史的视角研究新诗的发展历程。王泽龙在进行新诗研究时十分注重梳理诗歌发展的轨迹,对新诗每一阶段的嬗变规律进行分述,逐层深入后再总括其特点,努力在研究中为新诗寻找历史参照系。他注重将新诗放在中外文学大环境下进行对比分析,注重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力图还原历史发展的原貌,揭示诗歌发展的真实状况。《近三十年中国诗歌史观反思》一文体现作者诗歌研究的历史观。他认为我们在评价新诗时,既要看到历时进化的诗歌史,又要把握住诗歌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不能忽视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在寻找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要能自觉突破主体经验支配下形成的研究范式,摆脱先入为主的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束缚,尽量还原诗歌的原生态。

“中国现代诗歌构成了一个复杂丰富、多样多姿的历史形态。其中有进化发展,有倒退变异,在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纠结中,有倾向于坚守传统的经典,有主张借鉴西化的硕果,20世纪中国诗歌处在一个多元素发展的现代诗观念与现代诗形式的建构中。”面对如此复杂多元的中国新诗,我们需要更多地回到新诗本身探寻研究的切入点与突破点,为中国新诗的未来走向提供理论思考,这也是王泽龙一直努力的方向。

□周丹